

國中的來以八一九

編會究研史代現國中

1 9 4 3

目 錄

- 第一章 「九一八」後國民黨的對外政策**.....(1)
- (一)「九一八」的砲聲與不抵抗.....(1)
- (二)「一二八」抗戰與上海協定.....(5)
- (三)日寇進攻熱河與塘沽協定.....(10)
- (四)第一次華北事變與何梅協定.....(14)
- (五)第二次華北事變與中日談判的停頓.....(21)
- 第二章 「九一八」後國民黨的對內政策**.....(28)
- (一)「九一八」後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及其鬥爭.....(30)
- (二)國民黨的圍剿蘇維埃紅軍.....(32)
- (三)國民黨對抗日羣衆運動的鎮壓.....(38)
- (四)國民黨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44)
- (五)國民黨強化反動的政治機構.....(50)
- (六)反動統治的裝飾品.....(58)
- 第三章 「九一八」後的國民經濟與國民黨的經濟財政政策**.....(65)
- (一)「九一八」後中國經濟的滑翔.....(65)
- (二)國民黨是怎樣應付中國經濟財政危機的.....(76)
- (三)從「復興農村」到「國民經濟建設運動」.....(85)
- (四)國民黨的財政危機及其挽救方法.....(90)
- 第四章 「九一八」後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政策**.....(94)
- (一)「教育救國」的理論與實際.....(94)
- (二)「文化建設」呢？還是文化的毀滅.....(102)
- 第五章 「九一八」以來的民族解放運動**.....(108)
- (一)「九一八」後民族解放運動的勃發.....(108)
- (二)民族解放運動的潛伏時期(從上海

協定到長城抗戰).....(115)

(三) 民族解放運動的復興.....(118)

(四) 民族解放運動的繼續高漲.....(122)

(五) 六年來東北人民的解放鬥爭.....(128)

第六章 蘆溝橋抗戰以前的一戰形勢.....(133)

(一) 偽蒙軍的侵綏與綏遠抗戰。西安事變與國內和平的
開始。國民黨的三中全會及其內外政策的轉變.....(133)

(二) 日寇的加緊進攻。全國人民抗日情緒更加高漲。
英、美、法等國對華問題態度的積極化。南京
政府的對日政策。日寇的新進攻與蘆溝橋事變.....(136)

九一八以來的中國

(只供參考用)

第一章 「九一八」後國民黨的對 外政策

(一) 「九一八」的砲聲與不抵抗

九一八事變前夜，中國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長江流域發生空前大水災，十六省慘遭波及，災民七千萬，嗷嗷待哺，無以為生。同時軍閥混戰剛剛結束，鄂、豫、皖、湘、贛等省的剿共血戰正在展開，南京與粵廣間的大戰又在醞釀了。日本方面，則經濟危機與國內矛盾日益增長，物價跌落，輸出減少，工業生產停滯，工人失業增多，農民生活惡化，革命運動高漲，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尖銳化等等，在在都使牠決心向外找出路。在國際方面，歐美各國正陷在深刻的經濟危機中，無力兼顧遠東；蘇聯五年計劃未完成，國力尚未十分強大。

日寇趁着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銳意向中國進攻。先是一九三一年四月，日寇利用漢奸郝永德強佔長春萬寶山地方民地，五月遣使大批韓人入境開墾，強擄民田，槍殺當地農民數十，引起該處農民反抗，於是鼓動朝鮮各地排華運動，搗毀華僑在平壤、漢城等處的店宅，搶奪華僑財產，慘殺華僑數百人。跟着派中村大尉入滿蒙調查地理，「遇匪失踪」後，日寇即藉口向東北當局壓迫，實行徵集在滿日軍於瀋陽。復自行炸毀南滿路柳

條溝橋樑，誣稱爲華軍破壞。遂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開始軍事行動。當夜日軍一路進攻東北兩大營，先以大炮轟擊，駐軍死傷數百，華軍奉命不抵抗，日軍順利地佔領營房；另一路日軍向瀋陽城內推進，城內軍警也奉命絕對不准抵抗，任由日軍繳槍。到十九日晨，瀋陽全城，已被日軍佔領。所有軍、政、民、文化、財政等機關，悉被日軍佔領，全國最大的瀋陽兵工廠，製砲廠，及二百架飛機，完全入於日寇之手。統計一夜之間，損失達十八億元以上。跟着分兵進攻安東，本溪、營口、牛莊、長春等處，駐軍奉不抵抗命令，任從敵人佔領。二十日東佔吉林，南迫錦州，並派海軍佔領秦皇島，不久又進攻黑龍江，佔領齊齊哈爾。總共頭尾不到兩月，兩百萬方里的肥沃領土，三千餘萬人民，四千餘公里鐵路，無盡的資源，就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斷送了。

日寇之所以要進攻滿洲，爲的是完成大膽政策，滅亡全中國，獨佔東亞，進攻蘇聯，稱霸世界；爲的是挽救日益加深的國內經濟危機，以及緩和日益增長的國內各種矛盾，以免革命的爆發。

日寇進攻滿洲的行動，引起了歐美各國極大的反響，但因爲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及其本身利益的關係，並沒有積極的行動。英帝國主義爲着鼓勵日本的進攻蘇聯，不但默許日本的佔領滿洲，並且英外相西門在國聯會議上，是公開袒護日本的。他認爲滿洲的恢復九一八前狀態，「決不是正當的解決辦法。」法國對於九一八事變的態度，是和英國一致的，他也希望日本佔領滿洲後便會進攻蘇聯。美國因爲在東北的投資計劃，態度比較積極，但因爲得不到英法的合作，不敢單獨行動。在事變發生後不久，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三次打電話給英外相西門，徵求英國對付日本的方法，結果英國毫無確切表示（見史汀生著的遠東之危機）。因此，美國只得於九月二十五日照會中日兩國，希望依照國際條約和平解決。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錦州失陷，美國仍得不到英國的明確表示，才宣布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表示不承認日本破壞條約所造成的任何事實。這些都顯然是從美國本身利益出發的。蘇聯除指出日本的侵略行爲外，並動員蘇滿

境軍隊，增強自衛力量，以靜觀事變的發展。

南京政府對於日寇這個空前進攻的唯一辦法是不抵抗和依賴國聯。在事變之前，政府已「通令各軍，遇有日軍騷擾，務須慎重，避免衝突。」若事變發生，「我軍向政府請示辦法，政府也不許衝突，又以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爲免除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見南京出版的新亞細亞第三卷第一期記者自白）在事變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說：

「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見九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南京市黨員大會上演詞）

國民政府公開聲明：「現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見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告全國軍民書）

蔣介石更相信：「……國聯這一次開會，一定能依照公道的主張，找得和平的路徑，使東亞和平，以至世界和平，不致爲日本一國所破壞。」

又說：「我們現在固要盡力避免戰事，且在未至戰爭的時候，仍要鎮靜持重，無暴其氣。」

「我們在精神上已有最大的勝算，無論敵軍怎樣強大，怎樣來威脅我們，我們只是處之坦然，……我們更應相信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我們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犧牲的精神去擁護，橫暴不足畏，威力不足屈，我們要和平奮鬥，以捍禦此次的國難，以擁護國際的公約。」（見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國府紀念週演詞）

這些都是不抵抗和依賴國聯政策的鐵證。這種不抵抗和依賴國聯的對外政策，在國民黨的宣言中也明顯的表現出來。它說：

「當事變之初，中國即提請國聯處理，期以國際間保障和平機關之制

裁，伸張正義與公理。……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極力避免衝突，加意保護日僑，使無任何不幸事件發生……除依據決議……外，並履行中國方面關於該決議之其他一切義務。……並望國聯於此次開會時，執行盟約第十五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迅速予日本侵略行動以有效之制裁。更希望非戰公約與華府九國條約簽約之友邦履行其各該公約上之義務。」（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國民黨四次代表大會對外宣言）

南京政府不抵抗和依賴國聯的另一表現，是關於建立錦州中立區問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寇因為中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已順利地佔領了東三省，因此它又向錦州進攻，並收買流氓襲擊天津。政府為着貫徹不抵抗和依賴國聯到底，於是出當時的外長顧維鈞電令日內瓦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議劃錦州為中立區，希望日軍不要繼續進迫，而以中國駐軍退入山海關內為交換條件。這個投降的計劃雖然為全國人民的反對而失敗了，但南京外交當局顧維鈞却在致友人電文中表示「不勝感慨！」

雖然南京政府及東北當局對日寇進攻採取了不抵抗主義，但是中國人民則採取了頑強的反抗。從九一八第二天始，中國人民便跑上了反抗的道路。九月間，上海有十萬大中小學學生的大罷課，有三萬五千日本碼頭工人大罷工，以抗議日寇向東北的侵略。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有十餘萬人的反日大集會，全國各地，從上海到成都，從平津到廣州，所有的學生都捲入反對日寇進攻東北的熱潮中。全國民眾，尤其是城市的市民羣眾，熱烈地參加了抵制日貨和禁止和日人交易的杯葛運動。廣州及香港等地日商日廠所有的中國工人，自動地一律辭工，寧可挨飢受餓。十月初，上海八十萬工人組織抗日救國聯合會，派代表要求南京立即出兵抗日，要求政府發給槍械參加抗日。北平工人組織抗日救國會，組織郵工義勇軍、宣傳隊等，積極進行抗日工作。上海商業界也宣誓自十月一日起不買賣日貨。雙十節那天，上海又有八萬餘人的反日大遊行。十月十五日，上海五千餘學生跑到北站要求站長撥車到南京請願。一九三一年年底，十萬餘的平、津

粵、滬、漢等處的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政府對日宣戰，并毆傷政府人員，抗議他們的不抵抗政策。在這些抗日的羣衆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員均站在最前綫。

與這同時，有馬占山將軍部下兵士的抗戰。十一月中，在北滿嫩江鐵橋一役，擊潰了日軍的精銳部隊多門師團，造成了抗日戰爭中光輝的一頁。同時，遼西一帶民衆也奮起抗戰，攻入營口，奪回盤山，佔領打虎山車站，消滅古賀騎兵聯隊，收復錦縣，攻擊綏中，轉戰遼西。各地阻滯了日軍向關內的進攻，延緩了日寇迅速佔領東三省的計劃。不到一年，東北義勇軍會發展到三四十萬人，不斷給敵人以重大打擊。

當時中國共產黨根據全國人民反日民族運動的高漲，以及針對着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保障中國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之下，領導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英勇鬥爭。但當時的南京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國共產黨正確主張，而且到處壓迫了抗日救國的運動。

(二) 一二八抗戰與上海協定

日寇佔領東北以後，即努力尋找新的藉口，作為侵略的根據，適有日僧五人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華界被人毆傷，日寇便認為千載一時的機會，調集兵艦，故違尋釁。二十日晨，日特務機關聯合日僑於燬三友實業社，并殺死華捕一人，同時召開上海日僑大會，遊行示威，擄毀沿途華人商店。二十四日，日特務機關派人縱火焚燬日公使重光公館，作為進攻上海的藉口。二十七日，日領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道歉、懲凶、賠償損失、及解散抗日團體等四項要求，限二十四小時內圓滿答覆，否則日軍採取自由行動。當時上海市長吳鐵城已答應一一照辦，而日海軍陸戰隊却於二十八晚開始軍事行動，先佔天通庵車站，繼向北站、江灣、吳淞等處進攻。駐於淞滬的十九路軍，在上海市民，特別是在上海

人學生推動之下，實行了英勇的抗戰，奪回天通庵和北站兩火車站，激戰二日，殺敵千餘，給敵人以重大打擊。日寇一方佯托英美領事調停，停戰三日；一方向東京請援，以便擴大侵略。卒至三易主帥，不斷增援，死傷逾萬，費時三十天，才乘着十九路軍兵力不敷，在瀏河偷襲登陸，迫使十九路軍退至蘇州崑山等處的第二道防線。

日寇之所以進攻上海，是企圖把國際視線由東北問題轉移到上海問題上，是要在上海取得強固的軍事根據地，以鞏固它在東三省既得的勝利，以及將來作為進攻中國內地的準備，是要用武力直接威脅南京政府，使牠承認東三省的被佔領，使牠取消一切反日的排貨運動。

南京政府對於一二八事變同樣也是採取不抵抗政策。在事變之前，南京政府是處處遷就日寇的要求。例如由南京投書上海市政府答覆日領事館說：

「來函所提關於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在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軌違法行為，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消，以維法紀。關於此類之越軌違法行為，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於其他各抗日團體，并已令局予以取消。」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國府遷洛宣言中也說：

「政府為避免戰爭計，已不恤一再遷就日本要求，始則對於民衆抗日之言論行動，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繼則曉諭各種民衆團體，自動取消抗日名義，……以杜強隣之藉口。……上海市政府對於日本駐滬領事之要求，已予日領自身亦認為滿意之答覆……。」

又如調動抗日情緒較高的十九路軍離滬（據十九路軍將領之一翁照垣在淞滬血戰回憶錄說：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已接到南京政府命令，把駐在淞滬的十九路軍七十八師調往真茹，南翔、遺防由憲兵第六團接收，並且該團已於是日晚到達真茹，正待接收十九路軍防地，不過因為時間太晚，改遲一日），企圖「避免戰爭」。

又如政府命令海軍的不抵抗，更是駭人聽聞的，據監察委員高友唐等彈劾海軍部長陳紹寬呈文說：

「……當滬戰發生之始，海軍部長陳紹寬密令各艦隊，略謂：准日海軍司令來函，「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艦亦不攻擊中國軍艦，以維友誼」等情，凡我艦隊，應守鎮靜云云。厥後日海軍在下關開砲，該艦隊司令秉承部長意旨，下緊急命令各艦隊云：日海軍砲擊獅子山砲台，及京市，與我海軍無涉。非日艦砲擊我艦，不准還擊等語。同時上海高昌廟艦隊，亦奉到上項命令。……十九路軍曾向海軍部借大砲，借鐵板，均被拒絕。日軍運糧艦擱淺於白龍港三日之久，我海軍如當時前往轟擊，必可獲多數軍火。陳紹寬接得報告置之不理。所謂維持友誼者如此！以上各節，皆屬駭人聽聞，由該部次長李世甲專先與鹽澤祕密斡旋接洽。當十九路軍血戰時，李世甲竟與日軍司令野村，同坐汽車參觀各處戰壕，萬目睽睽，毫無忌憚。」（見監察公報第十五期）

在一二八事變發生以後，政府口頭上雖然宣佈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但實際上依然是不抵抗和依賴國聯。他不但不積極援助十九路軍和上海市民的抗戰，不但不增加兵力到上海，反而還自動請求參加抗戰的第五軍官兵，也多方留難，卒以該軍士兵的堅決要求，才不得不准其開入淞滬戰地。另一方面，則照會九國公約簽字國駐華公使，乞其轉電政府，出而干涉；並再次請求國聯主持「公道」。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因為在上海方面的利益較在東三省的利益為大，所以對於上海戰爭也較東三省戰爭為急。因此紛紛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英、美、法駐華公使也先後南下，奔走「調停」，其中尤以英使藍浦生為最努力。

在「調停」過程中，英、美、法、意、德五國，曾企圖把上海變為國際帝國主義共管的「中立區」。牠們為了實現這個計劃，於二月二日各自先後照會中日兩國，「……提議停止衝突，（一）雙方根據下列條件，

劃停止各種暴力行爲；（二）兩國間此後不再有動員或準備任何敵對行爲；（三）在滬中、日作戰人員，退出彼此接觸地點；（四）設立中立區，分離雙方作戰人員，以保護公共租界，該項地區由中立國軍警駐防，各種辦法，由領事團擬定；（五）兩國一經接受該項條約後，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據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決議案之精神，在中立國觀察者或參與者協助之下，迅速進行商議，以解決一切懸案之事議……」（見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七期）南京政府對於是項提議，已經表示完全同意。在南京外交部覆英美等國牒文中說：「對於貴國政府所通知之提議，特行接受。」日本則提出滬、漢、津、粵、青島等大商埠周圍，劃一不駐兵區，寬十五至二十英里，以爲對抗英美等國共管上海的計劃。（以上材料見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七期）

中國人民對於日寇進攻上海是極端忿恨的。當日寇在上海挑釁之初，即有上海滬西日紗廠五千工人的反日總罷工。一二八事變發生以後，上海市的工人青年學生等踴躍地直接參加抗戰工作。全國各地民衆，特別是海外華僑，即舉行廣大的募捐運動，以援助十九路軍和上海市民的抗戰。中國共產黨的上海黨部，更發動了全上海日廠十萬工人的大罷工，堅持一個半月之久，以協助十九路軍的作戰；同時組織了上海各界民衆的抗日聯合會，吸收了廣大羣衆參加這個組織，進行了廣泛的募捐和慰勞等工作，動員了許多民衆直接參加作戰，並出版「反日民衆」等報，積極宣傳抗戰政策。

在政府方面，則一開始就托英、美等國出任「調停」，不過初時因爲日本要求過高，一時不好馬上答應。到三月四日和十四日，國聯通過了兩個決議，要中日兩國在第三國協助下商訂停戰協定，並成立十九國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上海戰爭事宜，加以英、美、法等國公使聯合各國駐滬領事的積極「調停」，以及英美兩國的某些恐嚇手段（如美國太平洋艦隊集中橫濱山演習，以及英國通過在新加坡築港案等），更由於日寇進攻上海

的冒險行爲，遭遇到十九路軍及上海市民的英雄抵抗，使牠不能不稍形斂跡。於是由我方代表郭泰祺和日代表重光在五月五日成立如下的上海停戰協定：

「第一條 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週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戰鬥行爲。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條 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當時中國軍隊駐崑山蘇州一帶。）……

第三條 日本軍隊應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一如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之原狀。但鑑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點。……

第四條 爲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爲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佈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移交事宜，以便日軍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條 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詳見時事月報第六卷六月號。）

這些條文，表面好像沒有什麼，但其實際所給予中國的損失則非常大。例如第二條規定所謂「常態」，所謂「辦法」，是廣漢無邊，日寇可以藉口「辦法」尙未決定，「常態」尙未恢復，則由蘇州崑山至上海的廣漢地區，中國永無駐兵之權。又如第三條規定日軍「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各區毗連之地點，」所謂毗連地點，並沒有規定界限，十里，百里，均可隨日寇曲解。

不僅如此，除協定正文以外，會議錄中還有三項諒解：一是政府取締抗日；二是十九路軍換防；三是浦東及蘇州河南岸，中國不得駐兵。（見韓素著的激流集）這些「諒解」，後來事實證明，一一都成爲事實了。

抗日是「妨礙邦交」，十九路軍很快開到關連「剿共」，上海通商則不准華軍駐紮和設防，而日寇反可以把上海作為進攻中國內地的重要堡壘。

在上海停戰協定後，中國共產黨鑒於政府已向日寇投降屈服，於是公開對日宣佈民族防禦戰爭，并發表動員令，號召全國人民向日作戰。這種號召雖是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政府的回答却是「先安內而後攘外，統一才能禦侮。」（蔣介石語）

（三）日寇進攻熱河與塘沽協定

在上海協定以後，日寇努力於鞏固滿洲的勢力，建立滿洲傀儡組織，并與其訂立所謂「日滿議定書」（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把日寇所有在滿洲的侵略成果，都用明文確立起來。同時看到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歐美各國軟弱，於是進一步擴展其侵略區域，先揚言察河是「滿洲國」的一部，以為侵略的先聲；次宣言長城為滿洲的國界，以作攻取山海關及長城各口的準備。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寇向山海關進攻，華北將領閻錫山、張學良等雖聯名通電，聲言「誓死抵抗」，可是不到五天，守軍向柱國旅便奉命退出。

日軍佔領山海關後，即向熱河進攻。南京政府在全國人民要求下，對於熱河戰事表面裝成很關心的樣子。它揚言「熱河為北方屏障，且多天險，政府已有準備，至少可守三個月。」同時派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偕張學良等到熱河視察，以「表示政府抗日決心」（宋子文對熱河各界歡迎詞）。宋子文更裝腔作勢對熱河守軍說：「你們只管打，子文敢斷言中央必為諸君後盾，諸君打到那裏，子文跟到那裏，諸君打到天上，子文跟到天上，諸君打到海裏，子文跟到海裏。」（見宋子文告熱河將士書）可是，熱河戰事一開始，宋子文便悄然南回了。

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一路向熱河東部壓迫，湯玉麟部即不戰而退出關。

魯、朔陽、北票等地，使赤峯的孫殿英軍與凌源方面的東北軍穆德流、孫錦奎等師，陷於腹背受敵的困難地步。熱省主席湯玉麟，事前毫無準備，聞訊驚惶失措。三月一日，忽電平津徵集大批汽車，並將此項汽車二百四十餘輛裝載私產向天津租界輸送。湯玉麟本人也於三日晚率部離開省城承德，向灤平逃命。計自熱戰開始，到承德失陷，前後僅及七日，而日軍即佔領省城。所謂「誓死抵抗」，除孫殿英部在赤峯之戰及東北軍在凌源之戰外，實不見其他各軍的抵抗。

日軍佔領承德後，又向長城各口進攻，東迫喜峯口、冷口，西攻古北口，南下羅文峪。是時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推動了某些軍隊的自發抗戰。政府爲了應付全國人民的責難，也不能不暫時容忍這種自動的局部的抵抗。當日寇進到長城各口的時候，英勇的二十九軍士兵在喜峯口先給敵軍以重大打擊（三月十一日），跟着商震部在冷口，黃杰、關徵麟等師在古北口，也給敵軍以打擊。在這時候，集中在平津長城間的中國軍隊有三四十師，而敵人不過三四師，我軍力至少超過敵人十倍，如果政府有決心抗戰，全力出擊，不但可收回熱河失地，且可消滅長城附近的敵軍，但可惜因爲政府不抵抗政策作怪，一再蹉跎，坐使敵軍的防務日趨鞏固，反使敵人得以長城各口作爲進攻平津的據點，這仍然是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結果。關於這一層，就是連南京政府聚餐下的軍事評論家黃國選也是承認的。（見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期——抗日戰爭的歸宿）

日軍佔領長城各口後，又向灤東進攻，陷玉田、薊州，下南天門、石匣，直至把平津置於其包圍線下。

直到這時爲止，南京政府的對外政策，還是一方面不抵抗，他方面依賴國聯。原來自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即請求國聯「主持公理」，實施盟約第十一條，採取有效辦法，制止日本。可是結果只通過幾個空洞的決議，請求「雙方撤兵」。後來又接受日本請求派遣調查團到滿洲的建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國聯正式成立了以李頓爲首的「國聯調查團」。一九

三二年初到中國，費時八九個月，只草成一個洋洋二十萬言的報告書，企圖用國際共管滿洲的計劃來代替日本的獨佔，而國聯却依照這個荒謬的報告書通過一個國聯大會報告書。這個報告書的主要內容：前半部是胡說「九一八」事變的責任，不是日寇的侵略，而是中日兩國，後半部則提出了國際共管滿洲的具體辦法：（一）日本撤兵；（二）樹立東三省自治制；（三）解決中日一切懸案；（四）由大會組織一談判委員會，幫助中日進行交涉。但就是連這樣有利於日本，無利於中國的辦法，也遭日寇拒絕，并正式宣佈退出國聯，作為日本對國聯干涉的抗議。到這時候（一九三三年夏），政府依賴國聯的幻想已經完全破產，而長城抗戰也因為沒有決心而失敗，敵軍又兵臨平津城下，於是政府又一次對日本訂城下之盟。

在作城下之盟的前夕，南京政府的負責人汪精衛說：「言戰則有喪師失地之虞，言和則有喪權辱國之虞，言不戰不和，則兩俱可虞」（對上海新聞記者談話）。這也可見政府對日的毫無辦法，而必然繼續投降的道路。

到五月中旬，政府派親日巨頭黃郛北上「安定華北人心」。冀鄂抵平後，即派員向日軍叩頭，成立了所謂口頭諒解。是月三十一日，由北平軍分會總參議熊斌與日本關東軍岡村代表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又名塘沽協定。

塘沽協定內容如下：

「（一）中國軍隊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通州、順義、香河、寶坻、林亭口、蘆台所連之綫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前進，也不得進行一切挑釁擾亂之行爲。

（二）日本為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及其他方法觀察，中國方面應加以保護，并給以方便。

（三）日軍認中國軍隊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綫，不再越過該綫進擊，且自動撤歸長城綫。

(四) 長城綫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綫以北及以東地區內之治安維

持，由中國警察任之。」（詳見二十三年申報年鑑第十一頁）

這協定雖然僅僅是短短的四項，但他所給予中國的損失是極大的，可以說是民國以來除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約外對中國遺害最大的賣國條約。例如第一條規定，中國軍隊從灤東一帶撤退後，便不能再越雷池一步。這就是說，中國承認永遠不能收復東北四省失地。

又如第二條規定，日本「可用飛機及其他方法視察」，更可以作為日後進攻華北，囊括平津的藉口。因為所謂「其他方法」，包括無窮。用軍隊開入平津，可說是「其他方法」，武裝大批走私，也可以說是「其他方法」。這就種下了後來華北事變的惡果。

協定第三條規定，日軍自動撤歸長城綫。這就無形中承認長城綫為滿洲國界。至於「長城綫」究竟到什麼地方為止，也沒有規定。這就種下了後來日偽軍進攻綏東察北的藉口。

協定第四條規定，長城綫以南，灤東綫以北的廣大地區的治安，由華警擔任，這就無形中規定中國不能駐軍，這就產生了日後的冀東偽組織。

除此以外，如「挑戰」，「擾亂」，「不再追擊」，「應加以保護，並給予方便」等等醜惡字句，更不知侮辱我英男抗戰的將士多少。

從此以後，南京對於日寇的不抵抗政策，可謂「大功告成」，到達了空前的態度。可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不甘屈服的。正在南京政府與日軍代表成立「口頭瞭解」的時候，「抗日同盟軍」即在察哈爾宣告成立了。

先是日軍佔領長城各口及灤東通州以後，又唆使偽軍張海鵬、李守信、崔興五等匪部為先鋒，進攻察哈爾。五月二十日，佔領察東重鎮多倫，跟着沽源、寶昌、張北、康寶、商都等五縣也相繼不守，當地民衆及一部愛國軍人，便自動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這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事實。

抗日同盟軍的領導者是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將軍。他們的宗旨是對日抗戰，收復失地，這是符合於全國人民要求的。因此，成立之初，不過數千人，不旬日民衆自動參加，而增至十萬餘人。他們以廣陋不全的武器，不充足的給養，以及極困難的各種條件，卒能收復多倫、沽源、商都、張北等失地。但到八月十四日，卒因南京政府的種種壓迫（如收買孫殿英，派龐炳勳軍襲同盟軍後路等），使同盟軍總司令不能不辭職。

在馮玉祥離職後，方振武、吉鴻昌兩將軍堅持抗日同盟軍旗幟，并由方將軍代理同盟軍總司令，繼續進行抗日。分兵三路向灤東進攻。可是前有日寇的飛機大砲，後有何應欽、宋哲元等軍夾擊，直到十月十六日，方、吉兩將軍才不得已離軍，抗日同盟軍也不得不宣告失敗。

在這時候（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國共產黨根據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特別是全國軍隊及某些將領的傾向抗日，於是提出了三個條件（即（一）立刻停止進攻蘇區紅軍；（二）給人民以民主自由；（三）給人民以武裝抗日的自由）下，願和國內任何武裝隊伍成立作戰協定的號召。這號召，不僅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並且引起了南京政府嫡系軍隊的響應。據當時確實消息，「圍剿」江西紅軍的北路軍總指揮某將軍，曾要求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合共產黨一同抗日。但這要求，當然是被不抵抗的「國策」否定了。

（四）第一次華北事變與何梅協定

在塘沽協定後，政府對於日寇已經完全屈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與外交相輔進行」，以及「依賴國聯公理」「和平解決」等招牌，已經完全破產。政府爲了欺騙人民提出了「以建設求統一」的口號。至於對外問題，它已完全置諸腦後了。據南京政府當時宣佈的「整個國策」，是「治本莫若於充實國力，治標莫急於消除共產黨」（見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八日，蔣汪聯名通電）。在這裏所謂整個國策中，已經沒有對外，